

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 执政时期白银危机探析

胡海梅

(铜陵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进口国爆发了严重的白银危机,由此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艰难的处境,中国的民族经济、币制金融和国际收支平衡遭受巨大的影响。从国际关系视角对白银危机进行深入探讨,可得出国际因素在白银危机的爆发和加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结论。

关键词:国际关系;南京国民政府;白银危机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1-0043-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1.008

On the Silver Crisis During the Reign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 Hai-m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6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of silver, suffered a severe silver crisis, which led to a difficult situation for China's economy, where the national economy, monetary financ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were seriously aff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silver crisis and concludes that international facto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utbreak and aggravation of this crisi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ilver crisis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
主要流通货币。1934年,世界银价飙升,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进口国的中国,白银巨量外
流,严重动摇了中国脆弱的货币储备,造成国内
币值、汇率上升,信用紧缩,进而引发白银危机
和金融恐慌,本已破败不堪的中国经济走向崩
溃的边缘。白银危机的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
用的结果,除了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即西方列
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驾驭和对政治金融的渗透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白银危机时期的国际关系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震撼下,以美、
英、日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为了输出它们的过
剩商品和资本,摆脱国家危机,转嫁本国经济恐
慌,在南京国民政府陷入白银货币危机、筹划进
行币制改革以挽救中国经济时,力图把中国的
货币权掌握在它们的手中。

作者简介:胡海梅(1989—),女,安徽舒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一)中美关系

1934 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国际白银价格持续上涨,国内白银大量外流,这不仅加大了国际收支逆差,恶化了币值状况,更加剧了经济的衰退。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白银危机,摆脱经济困境,国民政府决定向美借款。然而此时,美国正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已把所有财力和资源都用于解决自身困境,无暇援助中国。对美国来说,施政的重点是恢复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不愿过多介入国际事务而影响自身政策目标的实施,因此不愿借款给中国。同时,由于日本侵华野心日益嚣张,且强烈反对美染指中国内政,美国也不愿由于对华借款而惹怒日本。正像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于 1934 年 11 月 26 日对罗斯福所说的那样,由于紧缩中国的经济,“美国正在做可能帮助日本的一切”^①。

由于美国政府不愿冒单方面卷入中国事务而激怒日本的风险,因此到 1935 年 1 月底,美国政府仍继续实施其购银政策,罗斯福对国际白银态势及中国白银危机现状仍持观望态度。从国际影响来说,美国的白银政策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策略,也仅仅是中美两国间的争执,而是涉及整个东亚国际局势的问题。因此,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1]。

中国在自身国力日益衰弱、经济问题越发严重之时,发生了白银危机,美国提高白银价格引发国际银价暴涨是导致此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自 1934 年 6 月,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后,世界银价暴涨,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继而引发国内信用紧缩和经济衰退。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资深教授杨格,曾作为甘末尔委员会成员之一来华协助解决币制危机问题,他在《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世界通货混乱》一文中指出:美国白银政策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的通货和经济状况^{[2][30]}。美国大通银行的董事长 W.

M. Aldrich 在美国参议院的“银行和金融委员会”中作证时也承认:“美国白银政策已使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2][30]}

(二)中英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尽管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但它们对华资本输出的脚步从未停止。其中,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投资远远超过欧美其他国家,到 1931 年,英国在华投资为 11.89 亿美元,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 36.7%^[3]。英国政府担心中国由于白银危机而经济破产,进而对英国在华利益产生严重后果,一度希望与美日联合实行对华援助,帮助中国实行币制改革,以脱离白银危机和金融动荡的困境,但英国的计划最终由于美国的冷淡、日本的反对而流产。

自中国发生白银危机以来,英国对华政策是在不断调整的,主要可以总结为两点:一点是对于英国来说,应该采取行动来改变其在华日益恶化的经济地位;另一点是,英国希望通过缓和中日关系来达到稳定东亚局势的目的,以应对日益危险的欧洲局势。为达到以上两个目的,英国派李滋—洛斯使团来华,采取对华主动外交的策略。英国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使英国政府坚持以得到美国和日本的赞同为前提,来解决有关对华问题。英国既想恢复往日在华的经济地位,又不愿与日本对抗。英国畏首畏尾的行为,不仅没有恢复其在华的经济地位,同时由于这种不诚实的行为降低了其在东亚的声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国民政府对国家货币危机采取自救措施的时机。英国外交部在 1935 年 11 月 26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也指出,中日危机不单单是由英国使团造成的,因为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妄图占领华北,并千方百计企图在中国成立一个自治政府,李滋—洛斯使团抵华只是将事态引至重关头,从而把日本入侵华北的威胁暴露出来^[4]。

^① Henry Morgenthau, Jr. The Morgenthau Diary II, 1934—1937. In Henry Morgenthau Jr. Papers,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p194.

（三）中日关系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日本经济也遭受了沉重打击。1931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降到1929年的67.5%，农产品价格几乎跌了一半^[5]。面对严峻的社会危机与经济困境，日本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对外扩张来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白银危机的爆发，在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经济，在政治上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日本伺机大举入侵中国。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又侵占了热河省，进逼北平、天津。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给予承认。而日本“天羽声明”的发布，更是彰显了其欲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侵略的加剧对1934年发生白银危机后的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造成了重大损害。

二、白银危机的表现

（一）国际白银升值、国内白银大量外流

自1932年起，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发展，西方工业国家相继放弃了金本位货币体制，实行货币贬值。黄金失去国际通货作用后被大量抛向国际市场，世界黄金供求严重失衡，黄金价格开始下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的持续下降使得白银价格上升，而使用银本位的中国，由于国际银价的上升，国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一系列白银政策的出台，致使国际银价出现非理性暴涨。因此，国际白银升值，是白银危机的表现之一。

中国银价也大幅上扬，但中国银价受国内货币购买力所限，涨幅小于国际银价，受利益驱使，中国白银被大量运往国际市场售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亦是白银危机的表现。据美国人杨格后来估计，仅在

1934年末的几个星期中，中国就有价值2000万元的白银偷运出口，1935年一年之内，白银从中国走私出口约达1.5亿—2.3亿元^[6]，几乎是当年白银正当出口量的4倍。大量白银外流，不仅减少了中国白银货币储备、海关岁入，降低了白银货币信用和国内经济预期，更直接导致中国发生金融紧缩和经济衰退。随着白银货币的大量外流以及白银币值和对外汇率的提高，中国于1934年夏爆发了白银货币危机，开始经历世界上其他工业国家在大危机中所经历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自美国出台一系列购银政策后，大量中国白银被通过合法运输和走私行为流到国外，更说明国民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白银货币，中国白银本位体制受到质疑。国内白银流动的方向虽然相反，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开或私运中国白银出口，以获取暴利。1934年1—8月，中国内地的白银大量向上海集中（总计2969万元），然后又流向海外以追逐高价；但9月以后，中国白银的流向突然逆转，白银由上海流向内地达8897万元，比1933年内地流向上海的全年总额（8189万元）还要多^{[7][73]}。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934年10月开征了白银出口税，白银开始流向内地，转向日本势力范围影响下的华北，依靠在华日商的治外法权大量走私白银出口。

国内外投机商人在日本的支持下走私了大量中国白银。1934—1936年中国白银通过海关出口额达42711万盎司，加上走私出口的21820万盎司，两者共计64531万盎司^[8]。白银走私的地区主要在北方，走私的路线是先把白银偷运出山海关，进入“伪满洲国”境内的东罗城，在北宁线的万家屯车站转运至沈阳或大连，然后运往日本境内^①。据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仅通过万家屯车站在1935年1—8月就私运中国白银2700万元^②。尽管当时中

① 转引自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山海关关于白银密输情况，调查材料第B4号（1936年2月），12—13页。

② 同上书，25页。

国政府对这种猖獗走私白银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却无计可施。因为以日本为首的白银走私者不仅享有在华治外法权，而且当时中国整个华北已属于日本武装力量控制区域。

(二)汇率上升、物价下跌、银行信用收缩

国际银价上升导致中国经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可以以商品物价作进一步说明。自世界银价上升后，中国商品批发价格 1932 年下降了 5%，1933 年下降了 9.4%，1934 年下降了 9.6%。中国的出口值在 1932 年下跌了 45.8%，1933 年下跌了 20.3%，1934 年下跌了 12.5%^[9]。

1931 年年底以前，影响中国物价整体水平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国内农业收成、国际商品价格以及国际白银价格。其中，服装和食品作为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主要商品，在中国整个消费品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价格走向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起了引导作用。在 20 世纪以前，中国食品价格经常随国内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而剧烈波动。同时由于受铜钱流通的限制，在农业收获季节，货币的短缺也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浮动。到 20 世纪初，随着银元的广泛流通，这种价格随季节变化的波动大大减少，并且每当银价上升使得国外农产品价格比国内便宜时，中国就会大量进口国外农产品。而对于中国的服装业，在 20 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依靠进口，因为这类商品的价格也受到国外商品价格和白银兑换率的影响。

在 1932 年以前，中国这些消费品的国内物价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保持一致，即使两者之间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也很快由进口货物数量的相应增减而消失。这充分说明外国消费品价格以及国外白银价格是决定中国商品价格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到了 1932 年以后，这些消费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别开始拉大。以 1934 年世界银价被人为哄抬为转折点，中国商品物价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0—1932 年，美国与英国商品的批发价格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出现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 12% 和 22%，中国的批发价格则上涨了 10%。中国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世界

白银价格下降而使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降低了 21%^{[10]10}。此时世界的萧条尚未影响到中国，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本来就很可能造成通货紧缩，在 1934 年美国通过《购银法案》之后，世界银价暴涨，中国银价亦水涨船高，但中国的物价却走下坡趋势。一直到 1935 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为止。1932 年年底中国的白银货币升值了 2.3%，1934 年升值了 8%，在 1935 年的头 9 个月升值了 9%^{[10]10-11}。

1934 年年底，中国国内汇率已上涨到历史最高水平，达到每天 70 分每千元的程度^{[7]106}。随着中国币值和利率的持续上升，中国银行业大幅度缩减资金并冻结放款，银行资金被转向外汇和债券市场，银行信用严重的收缩。

三、白银危机的影响

(一)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加剧

由于受国内动荡局势和国外紧张形势所迫，国民政府为了暂时摆脱经济困境，便采取缺乏远虑的应急措施。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积极采取措施稳定中国的币值、物价和汇率以减缓中国的金融紧缩和经济衰退进程，或是采用促进国内生产和推广销路的长远方法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是把目光放在征税或寻求外国帮助等短期行为上。国民政府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仅延长了中国白银危机持续的时间，扩展了货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恶化了中国白银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困境，而且延误了自主解决危机的时机，对其后来推行币制改革造成了巨大困难。

白银危机给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国家政治与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加剧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国的货币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反复讨论和斟酌，南京国民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 3 日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货币制度，实行纸币流通币制。

(二)农业和工商业生产日益凋敝

1934 年夏中国爆发白银危机后，银行信用收缩，国内币值和汇率升高，物价持续下跌，经济衰退。由于信用紧缩的加剧，使得国内人心

涣散、资金流出,中国农业和工商业生产日益凋敝,继而引起农村经济凋零、大量银行破产倒闭、国民收入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增大。

白银危机严重打击了农业生产,因为币值和汇率升高,使得农产品的原料及副产品难以出口,农产品不能变成货币,转化为资金。因此有很多农产品生产后,如果当年在市场上无法售出,农民根本不能收回成本。而在次年的生产季节,由于无法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农民仍投入资金去生产那些可能根本无法售出的农产品。这种对市场行情完全一无所知的盲目的农业生产,使他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和生产需求而纷纷破产。农业生产的这种恶性循环,不仅挫伤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消费能力,也使得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前进成为天方夜谭。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尝银价上升的冲击。

作为使用银本位的中国,物价的升降和银价的涨落成反比。中国银价升高则物价低落,加上外国货物充斥中国市场,造成中国银根紧缩,流动资金来源亦日益减少。这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当时国内许多工商企业不倒闭停业已是万幸,更谈不上扩大发展。据统计,1935年1—10月,仅上海就有1065家中小商业企业、银行和钱庄倒闭^[11]。

(三) 贸易入超增加,国民政府进一步成为美英的附庸

面对白银价格上升给中国政治经济带来的巨大打击,国民政府虽然采取诸多措施消除因银价上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经济弊端与金融顽症问题累累,外商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而且当时白银外流与复杂的国际政治也密切相关。这种内外交困的经济环境,对调整和改进日益严峻的中国币制危机几乎是步履艰难。

白银危机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美国实行白银政策,提高世界银价,同时又抬高中国对美国货币之间的汇率,这就使美国商品价格降低,大量倾销于中国市场;同时又使得中国的出口货物因汇价提高而缩小销路。中国严重的

贸易入超造成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迫使国民政府拿出国库储存的大量白银来进行弥补。当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设计货币改革委员会主席的美国人甘末尔也承认:“由于美国政府银价高涨,已使中国的银价激涨;这就是降低中国物价、增加中国人民的一切债务负担并有害于中国的出口贸易。”^{[2]30}

白银危机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造成国民政府进一步投靠英美,成为英美两国共同的附庸,而英美又反过来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国整个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垄断,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白银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然而它却给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和巧取豪夺国家财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白银危机中,国民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发行金融公债,相继对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实行增资改组,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具有全国意义、专营农村金融的“中国农民银行”,使四大家族与农村封建势力加强了联系。同时设立中央信托局,改组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金融垄断组织。国民政府在进行白银币制改革时,又宣布把白银收归国有,并禁止现银在国内流通,借此掠夺了国内民众的大批财富,最终完成了其早就梦寐以求的对全国金融的垄断。

清末至国民政府白银危机发生时期,中国所提倡的币制改革都是认为白银货币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形势,中国货币必须改行金本位、金汇兑或其他货币本位制度。尽管这些建议和主张不尽相同,但宗旨都是要解决中国由于使用银本位而在国际货币与商品市场上的劣势地位。其中,确立的“银元本位”和“废两改元”的货币管理与改革,虽然较以前有所改进,但也没有解决中国货币制度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 [1] 江昭,孔华润. 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41.
(下转第57页)

原出处有《西岩》《虎鼻峰》《武婆冈》三诗，道光六年杨切等纂《泰和县志》卷四一有《龙王洞》，亦署“刘敏求”。四诗分见刘崧《武山十四境》之《西岩洞》《虎鼻峰》《武姥冈》《龙王洞》，虽略有异文，然可断为同诗。刘崧亦泰和人，《泰和县志》载其诗甚多，且四诗见上文所引其《槎翁诗集》。则四诗定非刘敏求作，《泰和县志》署作者有误。上文所录《通天岩》等六诗未见文献载为他人作，暂仍归于刘敏求名下。

15.《王山三坛》三首：“霞衣玉佩去飘飘，控鹤仙人不可招。谁信岭头顽石畔，分明一路透丹霄。”“炼丹人去事旋空，丹井犹存第二峰。但怪井中失双鲤，不知双鲤化为龙。”“坛边马鬣一坟孤，空葬衣冠是也无。英气不随世埋没，长为霖雨泽焦枯。”三诗均见乾隆《泰和县志》卷四〇。

以上刘敏求现存诗18首，古体、近体兼备，均为描摹山水、咏叹古迹之作。敏求当江西诗

(上接第47页)

- [2] 张素民. 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3] 英国对华投资之利益[J]. 外交月报，1936(2)：3.
- [4] WOODWARD E L.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M]. 2nd Series. London: H. M. S. O., 1962:569.
- [5] 凌耀伦,熊甫,裴倜. 中国近代经济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383.
- [6] 杨格.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44.
- [7] LIN W Y. 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M]. Chicago, I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派流行之世，又服膺黄庭坚，但其诗绝少用事之作，白描清扬，怀古深邃，青山绿水中寄予兴废之叹，自有超尘脱俗之气流出，卓为大家。

参考文献：

- [1] 厉鹗. 宋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876—1877.
- [2] 刘崧. 槐翁诗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 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478.
- [3] 谢曼. 江西通志[M]. 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963—976.
- [4] 傅璇琮. 全宋诗：第25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6566.
- [5]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343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07—208.

(责任编辑：李秀荣)

- [8] CHENG Y K.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 [M].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 D. C., 1956:262—263.
- [9] LIN W Y. China under depreciated silver, 1926—1931 [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36:184.
- [10] CHANG K N.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M].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8.
- [11] 吴岗. 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8.

(责任编辑：李秀荣)